

翻读古籍看小暑

□魏益君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唐代诗人元稹在《小暑六月节》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仲夏图景。这首诗犹如一部微缩的节气纪录片：暖风扑面，竹雨潇潇，远山雷动，檐下生苔。诗人更以“鸂鶒新习学，蟋蟀莫相催”的意象，道出小暑时节万物竞发的勃勃生机。

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节气，小暑标志着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云：“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此时虽暑气渐盛，却尚未达极致，恰似青春将逝未逝时的微妙光景。古人以“小暑”名之，既见农事智慧，更显诗意。

小暑时节总能激发诗人无限灵感。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描绘的是一幅夏夜纳凉图：“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诗人以白描手法，将荷风竹露的清凉与知音难觅的惆怅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一种“静中有动”的审美意境。这种借景抒怀的笔法，正是盛唐诗人的典型特征。

独孤及在《答李滁州题庭前石竹花见寄》中，则为我们定格了小暑时节的独特花信：“殷疑曙霞染，巧类匣刀裁。不怕南风热，能迎小暑开。游蜂怜色好，思妇感年催。览赠添离恨，愁肠日几回。”石竹花不畏酷暑的品格，被诗人赋予了深刻的人文内涵。诗中“游蜂怜色好，思妇感年催”的比兴手法，既写花之形，更传人之情，展现出唐代赠答诗托物言志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消暑》则道出了古人应对炎夏的智慧：“热散由心静，凉生为室空。”这种“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在今天这个空调普及的时代，依然值得我们深思。而李频《安禅逢小暑》中“安禅逢小暑，抱疾入高秋”的句子，则展现了佛家“以静制动”的修行境界。

此外，武元衡的“小暑金将伏，微凉麦正秋”、耿漳的“小暑开鹏翼，新莫长鹭涛”、张说的“小暑夏弦应，徽音商管初”等诗句，无不体现唐代诗人对这个节气的特殊情感。他们或以景入情，或借物抒怀，将小暑时节的物候特征与人生感悟完美融合。

翻阅这些千年诗篇，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古人笔下的仲夏风情。在这些诗句中，小暑不再是简单的气候概念，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国人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对生活的诗意理解。在空调房里品读这些古诗，或许能让我们重新发现季节变换的韵律之美。

■嫣然思语

照亮（外一首）

□向敬之

那是谁的眼睛，
穿透长夜的黑？
那是谁的明月，
照亮我的心扉？
那是谁的微笑，
染亮闹春的梅？
那是谁的记忆，
漫过我的沉醉？
我默默地来，静静地追，
追寻萤火点燃的笑脸。
看那最美的芳华绽放，
照亮如春的旷野，绚烂如飞。
是谁照亮了我，
我又照亮了谁？
无需多问，无需多想，
风雨中托起日月同辉。

亮点

千重山，万重水，
日月经天江河飞。
烟雨路，繁花开，
星空点亮梦儿追。
飞过山，飞过水，
魂梦牵绕浴春晖。
在家乡，去远方，
光明偕行爱相随。
用爱点亮这世界，
千里万里无限美。
海无涯，路迢迢，
紧握未来照心扉。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一栋老楼，是岁月给文学的留白

□张君成

一栋楼之于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是“归属感”，也许是“信任”，也许仅仅是“一间不被打扰的办公室”。但更本质的，是一种时间的共处关系。它不参与书写，却始终注视；它不评判好坏，却能沉淀分量。就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一个个老沙发与旧椅子，坐过阿来、张炜、苏童……不发声，却见证了每一次心灵的交谈。

所以，这次搬家，于人文社而言，不只是一场空间的转移，更是一次集体记忆的发掘与迁徙。

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它有体温、有重量、有气息。而那些气息，往往来自编辑室的一张纸条、样书间的一本初校，或者是走廊尽头那个泛黄的“编校流程卡袋”。它们不起眼，却真实；不热闹，却隽永。

朝内166号的老去，是必然。但它的价值，不会随脚步消散。人文社已明确，这座建筑将进行原貌保护与文化升级，未来将转型为集出版史展示、文化交流、创意孵化于一体的文学地标。老楼会休息，但它不会隐退；它会沉静，但不沉寂。

其实，文学也是如此。看似慢，看似

旧，看似不合时宜，但它一直在，像那堵老墙，风吹雨打不倒；像那句好句，时过境迁仍有回音。

有人说，搬离是告别。可我更想说，这是一次更深的靠近。我们终于有机会回望，那些曾被日常遮蔽的珍贵角落；我们终于意识到，那些再平凡不过的纸张、桌椅、光影，原来都是时代与文学温度的存储器。

就像一位老编辑所说：“我们不是搬走文学，而是把文学的初心一起打包。”而我们也相信，那份初心，会在新的办公

敬启，致必不可少的你

□崔洁 杨吉

朋友，你好：
我们同生一座城，一片土地，在最寻常的角落，我曾不止一次见过你的背影。

你很年轻，一半蓬勃昂扬一半彷徨迷茫，是青春应有的模样。我记忆中还有这样一位青年，就在百年前的包头，遥远时空的那一端。他叫丁道衡，1927年踏足白云鄂博时，刚刚28岁，与你同龄，同样身处探索与困顿并存的生命状态。不同的是，他所面对的是尚未被世人知晓的矿藏与荒原。当时中国的地质学尚在襁褓之中，北方的草原与矿山仍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下。而丁道衡怀揣着对科学的信仰，背着简陋的仪器，走进了阴山北麓的风雪中。他或许也曾问自己：“这片荒凉之地，真的值得追寻的宝藏吗？”但地质学家的敏锐与青春的执着，让他在白云鄂博的岩层中发现了奇迹——中国首个大型稀土矿床。

世界一刻不停地质问着年轻人，你对他们都一样。28岁的丁道衡，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目光穿透岩层，最终让中国

的稀土资源从隐秘走向世界。如今，你的代码、你的设计、你的创新，或许也会成为某个时代的“火光”，照亮未知的领域。

朋友，想必三十已过的你已经急于寻求人生的答案，笃定和坚韧渐渐从概念成为你生活的习惯，其实，我们的城市初创时便被赋予这样的品质。也是在35岁，郑天翔率领远省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进驻包头城。我该怎样向你描述1949年的人们对于工业强国怀有怎样的执念呢？那不单是梦想，更是亟须摆脱积贫积弱、耻辱记忆的中国人基于性命的尊严，所以国家在一片无法打出一颗钢钉的荒滩描绘了一座钢城。

彼时草原钢城是缥缈的海市蜃楼，压在郑天翔等中青年人的身上便重若万钧。他焦虑吗？他会因时不我与而寝食难安吗？我猜，你会，他也会。不然便不会在三年间走遍包头地域的城区乡村、山野矿脉，规划城市与工业，从全国招徕知识分子进行教育体系建设，甚至连图书馆、文化馆都细致安排。但他也会如你一般，面

对绵延丛生问题一件件干、一步步走，不求一蹴而就，所以这样一个热气腾腾、铿锵作响的梦幻真就矗立于大地上。1959年，周总理出席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仪式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工业化基础已经在包头打下了。当时郑天翔又在北京继续事业，尽管并未目睹成就的一刻，但我想他定会满腔自豪地远望那一抹灿烂的钢花，然后继续手头的工作。正如30多岁的你，承上启下，前人开辟，后人成就，你去创造。朋友，请你继续慢慢地、稳稳地前行和拼搏，你会记得，我会记得，这座城市也会记得。

嗯，40多岁是怎样的年龄呢？不惑到知天命的中间段落，但命运未必会因青春远去便赐予我们平和与安宁。1996年，这座老工业基地被自满、迟钝的老气笼罩，大中型国企技术落后、效益不佳，下岗职工众多。44岁的牛玉儒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包头，正所谓临危受命。朋友，你也是44岁，你少年时是否见过那个一身西装脚踩布鞋、骑着自行车在街头巷尾



陇原青色

田野 摄

“长编考异法”与“国学编年史”

□孟繁强

在12卷《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的蓝图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有一种长跑运动员终于看到终点线的解脱感。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当我接手这部书稿的时候,同样有“三畏”。第一畏是“兹事体大”。《编年史》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与编年史编纂”的标志性成果,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桑兵任首席专家,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因此这部书自立项以来一直受到集团领导的特别关注,要求一定在出版基金的时限内完成,同时还要保证质量。

第二畏是“经纬万端”。本书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试图以“编年体长编”的形式网罗近代中国“国学”万象,堪称雄心勃勃,自然体量也令人望而生畏——12卷、380余万字。中山大学于梅飏、华南师范大学杨思机、浙江大学张凯等作者分别负责不同的卷次,参与项目复终审、编辑、校对,的至少有30人,其中还有在外地的,如何协调衔接、平衡取舍,成为项目成败的关键。端赖主编桑兵和关晓红牵头统筹,为全书发凡起例;5位作者全面爬梳所有以国学为名或与国学相关的机构、学人、学会组织、出版物的文本史事,根据篇幅年代分别卷次,建立相关史料文献资源库,为编辑加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各卷编辑线上线

下定时不定时的进度碰头会、线上工作群和协作文档,让身处各地的主编、作者、编辑对进度做到心中有数,也在公开透明中明确分工,强调协作,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家的焦虑,让每个人能够持续地为一个目标而努力。

第三畏则是“治丝益棼”。正如《总序》所言:“国学”的内涵外延从未清晰统一,“言人人殊”是其常态。如何令读者体察和理解不同时空坐标下,“国学”被提出、被争论、被实践、被塑造的方式?可以说,本书的编纂是桑兵教授长期反思治史方法后的一次“思以致用”。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提出: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史方法,是在宋代史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而宋人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精当。长编考异法的主要形态正是按照时空顺序排列比较材料,《编年史》的编辑工作如何遵循、实现这样的编撰旨趣,是我遇到的最大挑战。

桑兵教授在2019年的文章《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中进一步探讨道:“长编的价值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为详。首先是资料的详尽详备,搜集资料要尽可能竭泽而渔,不避烦芜,不溢美,不掩饰,不附会,不趋时,不拘泥于所谓直接间接一手二手等外型判断,所有类型的史料一律平等,关键看是否相关。”《编年史》利用期刊、文

集、日记、书信等数百种史料。之前出版的《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但是从影印到文字的“最后一公里”仍然需要编辑一步步走完。我和其他几位编辑首先要利用作者们提供的史料文献,其次要查询各种文献数据库,如果仍然缺少部分信息,只能自己跑图书馆翻找纸本。此外,许多报刊影印本文字漫漶不清,文法用例与现代汉语习惯相悖。在保存历史原貌与编辑规范之间,编辑需小心翼翼地走钢丝。

正因为“近现代史料种量繁多,史事曲折复杂”,所以桑兵教授认为“最适宜用长编考异之法加以整理……呈现错综复杂的历史本相和前人本意”。因此在解释史事的时候,就“绝不能脱离其产生的具体‘时空人’背景”,“要前后左右读书以通语境”。但仅仅“回到当时语境”只是第一步,长编考异法的精髓在于“考异”,即“喜聚异同”。用傅斯年的说法就是:“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如作者以“1902年1月6日”作为明确的时间节点,将沈曾植的信函定位在具体的历史时刻,这是“长编”的基础。与此同时引入

了与此时间点相关或可以进行比较的多种史料。沈曾植在此前后与其他人(盛宣怀、罗振玉等)通信,以了解其思想的连贯性。黄遵宪与梁启超关于创办《国学报》的讨论(时间相近),展示了当时另一路知识分子对“国学”的思考。《日本国志》及报刊上关于日本国学、国粹主义的介绍,展示了中国士人“国学”思想源头之一和参照系。在这种并置和比较中,读者审视域内外不同人物、不同文献“国学”用法的异同,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沈曾植信中“国学”的特定含义及其在当时思想光谱中的位置。这正是“考异”方法的运用。

在回到语境、“喜聚异同”的过程中,编辑要面对处理“详”与“异”关系的挑战,在《编年史》的历时关系中,兼顾共时事件。在内容安排上,编辑需要通过恰当的编排,在展现多元声音的同时,维持叙事的清晰和逻辑的连贯,引导读者在复杂的异同中把握主线。在具体措辞上,作者基于“考异”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多种合理解释的空间,编辑需要与作者沟通,在考据细节和历史解释之间小心平衡,确保论述的严谨性和客观性,避免过度推断或预设立场。编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确保《编年史》希望达到的微妙平衡:长编的“详”不能走向资料的无序堆砌,“异”不能导致叙事的支离破碎。

桑兵教授说希望《编年史》“大幅度夯实近现代研究的基础”,“形成检验各种观点主张的尺度准绳”,同时又“可供对近代国学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编年史》即将接受读者的检验,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那将是作者和编辑最大的慰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